

先秦史官缘何知天道晓人事

清人龚自珍在《定庵集》里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高度重视历史，历来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先秦文献与诸子对历史的重要性就有着清醒认识和深刻阐发。

教诲天子

《国语》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典籍之一，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全书以国分类，记言论事，上起周穆王，下至鲁悼公，前后跨越500年。书中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史事，包罗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

《国语》常与《左传》并称，是研究先秦特别是春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重要文献。其中，对“史”的重视主要有两个表现：一个是担任史官职务的人，大都成为贤明的智者；另一个是强调学习历史可以使人明智。

《国语·周语上》记载了著名的“周厉王止谤”故事。周厉王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政策，将山林湖泽改由天子直接控制，不准国人渔猎采伐。国都镐京的人因不满周厉王的政策，怨声载道。

大臣召穆公进谏说：“民不堪命矣！”周厉王却命令巫巫监谤，禁止国人谈论国事，违者杀戮。在周厉王的高压政策下，国人就不敢在公开场合议论朝政了，甚至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谈招呼，只用眼色示意一下，然后匆匆走开。这就

是“道路以目”典故的由来。

周厉王得知这种情况后，感到十分满意。他对召穆公说：“我有能力制止人们的非议，他们再也不敢议论了！”召穆公劝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可是，周厉王对此置若罔闻，最终导致“国人暴动”，周厉王被放逐到彘，郁郁而终。

在召穆公的谏言里，专门提到“瞽、史教诲”。给《国语》作注释的三国时期吴国人韦昭说：“史，太史也。掌阴阳、天时、礼法之书，以相教诲者。”意思是说，太史掌管天文、历法与各种仪节，所以对天子负有教诲职责。他们都是贤明的智者，知天道，晓人事。

教育太子

《国语·周语下》还记有“单襄公论晋将有乱”一事。

在柯陵盟会上，单襄公看到晋厉公走路时眼望远处，脚步抬得很高；又见晋国的郤锜语多冒犯，郤犇谈吐善绕弯子，郤至则自吹自擂。于是，单襄公对鲁成公说：“晋国很快就要发生内乱，国君和三郤恐怕都要大难临头了。”鲁成公问：“你说‘晋将有内乱’，这是从占卜得知的天意，还是根据人事推测的呢？”单襄公答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单襄公否认自己知天道，却承认了知天意是史官的职能。

《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晚期，周王室衰败不堪，郑桓公感受到风雨飘摇的危险局面，专程去请教王朝太史伯阳父，亦称史伯。对于桓公的疑惑，史伯报以长篇大

论，详细分析了天下形势，并为郑桓公及其宗族选定虢、郟之地作为东迁居处，从而为春秋初年郑庄公始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郑桓公还曾请教有哪一些国家会兴盛，史伯给出的答案是晋、秦、齐三国。形势发展正如史伯所预言，这些国家的国君后来都位居春秋五霸行列。可见，史伯不仅熟悉西周各种典籍，而且对西周诸侯国的情况了然于胸。所以，后人称史伯为西周末年尽知天下事的第一人。这显然与其担任的王室太史职务是分不开的。

或许是由于史官的智者形象，学史使人明智观念的流行也就顺理成章了。《国语·楚语上》记载，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请教申叔时如何教育太子，申叔时提出有9种书是太子必须要学习的：“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体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这里可以看到，申叔时列出了“春秋”“世”“诗”“礼”“乐”“语”“故志”和“训典”这几种要“教之”的文献。其中，多达5种即“春秋”“世”“语”“故志”“训典”等都是史书类古书。学习的目的，无论是“昭明德而废幽昏”，还是“知废兴者而戒惧”，着眼点都在于以史为鉴，体现了“多

闻善败以鉴戒”的学习意图。

问学智者

上面用《国语》记载的故事为例，叙述了春秋战国先民对“史”之社会功能的认识。其实，战国及秦汉时期流行的诸子文献中也包含同样的意蕴。

例如，《吕氏春秋》里就讲到夏桀、商纣和晋国末年的三位太史：夏太史令终古、殷内史向挚和晋太史屠黍因分别见“夏桀迷惑，暴乱愈甚”“纣之愈乱迷惑”及“晋之乱，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故而“出其图法，执而泣之”等。《吕氏春秋》的编撰者将这三位太史视作“守法之臣”，并专门强调由于史官智者身份与尊崇地位，故视之为“先识”，即有先见远识的智者。

著名的“孔子问学于老子史事”，在先秦诸子典籍中，如道家的《庄子》、儒家的《礼记》和综合各家学派的《吕氏春秋》中都有反映。《庄子》中至少有8条是记述孔子与老子的。其中，《天地》篇记述老子跟孔子谈“至道”的问题；《天道》篇记述孔子与老子谈《诗》《书》《易》《礼》及“仁义”等情况；《天运》篇记述老子跟孔子谈求道、仁义、古代典籍及“三皇五帝治天下”等问题；《田子方》记述老子跟孔子论“天道”；《知北游》记述老子跟孔子谈天地万物的自觉性。

《礼记·曾子问》中，也用四则的篇幅记载了孔子说到老子之事，其中三则是“吾闻诸老聃曰”，另一则说到“吾从老聃助葬

于巷党”。内容上，都是在某一特定情况下，孔子从老子那里得到的教示。

值得注意的是，在《庄子·天道》篇记载的“孔子见老子”故事中，通过子路之口明确指明老子的史职身份。将这一情况与上述老子广博的知识面相联系，一个贤明智者的形象跃然纸上。可见，诸子文献都认同史官多为智者。

总之，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这一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的宝贵传统，让中华文明绵延千年而从未断绝。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特别是，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极其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面对这一情形，广大文史工作者更要继承先秦史官的优良传统，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牢固树立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充分发挥史学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积极作用，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出应有的贡献。

（文/杨博 来源：《解放日报》）

唐朝谏官如何当好“喉舌”

古代中国，谏官的谏议职能大体上与朝廷决策的上下各个环节密切相关。通常情况下，台官是“耳目”，谏官为“喉舌”；御史助皇帝监察百官，谏官则重在规劝、匡正君主。为发挥谏官制度的作用，有些王朝还规定了回避制度，规定父为宰相、子不得为谏官。

有唐一代，谏官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谏官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舍身成仁的思想为指导，努力履行监督君主及中央决策的角色。唐朝谏官系统内部分工各有侧重、职掌分明。其中，左散骑常侍职掌规讽过失，谏议大夫职掌谏诤得失，给事中职掌百司奏抄的驳正违失，补阙、拾遗职掌供奉讽谏。

唐太宗时期，宰相讨论朝政必须有谏官参加。宰相不便讲话，谏官但说无妨，错了也不要紧。唐玄宗时明确规定，谏官奏章各部门不得滞留，无论早晚均立即呈上。后来，李林甫任宰相后，刻意打压谏官，谏官职能受到极大影响。唐朝后期，受多种因素影响，谏官权限及职能发挥都有了很大变化。不仅参与朝政议政的机会大大减少，而且多不被君主召见，进谏与监督君主的人言行日趋减少。

一般认为，导致唐代谏官职能发生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宰相专权。谏官言进政得失，故掌权者多不愿其举议。对于宰相尤其是专权的宰相而言，其主要防范的对象就是可以直接进言皇帝的谏官以及掌握弹劾百官权力的御史。

唐代宗时规定，百官凡欲论事要先白长官，长官白宰相，然后上

闻。颜真卿上疏称该事旷古未有，李林甫、杨国忠也不敢公然如此。颜真卿作为著名书法家，登进士第后历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御史大夫。卢杞为陷害颜真卿，建议派颜真卿为宣慰使，去安抚叛军。结果，颜真卿被杀。

虽然谏官制度在后期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但纳谏在唐代始终占据主流位置。长庆四年，左拾遗刘栖楚进谏穆宗每日上朝时间较短，指责皇帝即位未几恶德布闻，并称身为谏官不能规劝，遂以额叩地振响之声闻于阁外，血流不止。唐穆宗为之动容，后升刘栖楚为起居郎，但刘栖楚坚辞不就。当年底，升刘栖楚为谏议大夫，以表彰其勇于进谏。

总的来看，进谏活动不仅是谏官职能的体现，而且体现了士大夫的道德良心及其对国家命运的关注。有唐一代，虽不乏媚上邀宠的无耻之徒，但主流仍是尊崇儒家传统而不惜性命进谏的刚正之士。对君主而言，虽然不喜听逆耳之言为人之本性，但也不想让江山断送在自己手中，这也是君主愿意纳谏的根本原因所在。

唐朝末年，唐僖宗杀左拾遗侯昌业。一般认为，杀谏臣为亡国之兆。果然，杀侯昌业同年，黄巢起义军攻克都城长安。唐僖宗仓皇逃往成都后，又因宦官田令孜之故置左补阙孟昭图于死地。时人感叹，以谏官杀谏臣自古未有。之后，唐僖宗又因事赐死左补阙常潜。唐僖宗一朝杀谏官三人，足以预示唐朝将亡。

（文/刘社建 来源：《解放日报》）

北京胡同前世今生：

始于元朝 名字五花八门

说起胡同，那大概是北京城的一大特点：灵境胡同、百花深处胡同、月光胡同……看上去都是灰瓦灰墙一个模样，可要是花点儿时间走上一圈，再跟住在胡同里的老住户聊聊，就能发现几乎每条胡同都有故事，趣闻掌故里还有满满浓浓的邻里情。

按《北京胡同志》里所言，胡同，是城市中一种狭长的通道。它是由两排院落墙体、宅门或倒座房、后罩房的屋墙连成的两线建筑物构成的。在两排宅门之间，胡同形成了一条隔离空间带，便于宅院的通风、采光和居民出入。

具体到“胡同”二字，其由来有许多说法。比较流行的一种是“胡同”源于蒙古语，即“水井”之意，或说“有水井的地方”，原是蒙古语的音译，一般认为，胡同是元朝出现的，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仅胡同这一个词，就有街通、胡同、衙衙等多种写法。

公元1276年，元朝在毁于战火的金中都原址东北部，按《周礼》之原则建立了“状如棋盘”的大都城。按照当时元朝政府颁布的规划，官吏、贵族等纷纷在都城内外修建住房及院落，一排排连接起来，再留出通道、通风采光的合理距离，最后便形成了胡同、小街和大街。有说法称，最早见诸于文字的“胡同”在元杂剧中，关汉卿杂剧剧本《单刀会》中，便有“杀出一条血衙衙(胡同)来”语句。

到了明朝，明成祖朱棣迁都

北京，北京城的城市造型又有了一些变化。这时北京城的胡同，据《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载：有街巷711条，胡同459条，共为1170条。此后随着北京城城市规划的变化，胡同的数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有了胡同，就得有名字。最开始北京的胡同叫什么，并不是古代官府规定，就是居住在胡同里的老百姓随口叫的，被大多数人接受后随即传开。胡同的名字包罗万象，既有山川河流、花鸟鱼虫，又有物姓氏，令人眼花缭乱。

还有的胡同，名字跟地形还有一定关联。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里写到过“小羊圈胡同”：“说不定，这个地方在当初或者真是个小羊圈，因为它不像一般的北平的胡同那样直直的，或略微有一两个弯儿，而是颇像一个葫芦。”

不过，后来随着胡同越来越多，名字重复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加上有一些名字难登大雅之堂等种种原因，曾经不少胡同也改过名字。比如“狗尾巴”胡同，改为“高义伯”胡同；“劈柴”胡同改为“辟才”胡同，“粪厂”胡同改为“粉厂”胡同等等。

“拿来给一条胡同命名的，一般是里头具有标志性的建筑物，也有店铺、植物、人物、故事传说等等。”京味作家刘一达在北京胡同生活多年，对其中一些掌故轶闻颇为熟悉，还曾专门出过一本书叫《胡同范儿》。他说，早年间胡同

里的生活条件并不好：土路在雨天会泥泞不堪；冬天非常冷，天黑了都很少有人敢单独出门……但胡同里街坊四邻浓郁的人情味，却是永远令人怀念的。

“过去北京没有这么多人，胡同里非常幽静。大点儿的胡同不敢说，但小胡同里十几个门住着的邻居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都很亲切。”刘一达说，小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不锁门，有时候钥匙留给邻居，有时候就搁在蜂窝煤里边，“不像现在，一重又一重的防盗门。”

那个时候，胡同里有谁家做了点儿好吃的，都会给邻居分一分；有农村的亲戚带来了新鲜的花生、栗子，也都给大家尝尝，街坊四邻就像是一家人。刘一达一直怀念那种亲情与祥和安静的氛围，“天天吃窝头臭豆腐，但觉得很知足，没有现代人那么多焦虑感。”

胡同里的孩子，大概最盼望的是卖零食和玩具的小贩，听见吆喝声一响，拔腿就往外跑。刘一达便曾经拿着2分钱去买了一碗炒虾米，“就是河里的小虾米，捞出来炒好了卖。还有小贩自己做的小吃，热包子、馄饨，觉得那叫一个好吃。”

“现在有些人向往过去胡同里的生活，我觉得，应该不是喜欢那会的生活条件，而是胡同里那种慢节奏的、悠然自得的生活状态。真的令人神往。”刘一达回味道。

是的，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历史上存留下来的胡同正在日益老去。但不管怎样，它曾是北京老百姓生活的地方，也是北京历史演变的一个载体，记录了时代的风貌。行走其中，总让人时刻感受到老北京浓郁的民俗风情与文化气息。

（文/上官云 来源：中国新闻网）